



母亲离开我们三年多了。在这三年里,我好像依然看到母亲做缝衣的身影,依然听到母亲缓慢而亲切的话语,依然想起母亲用过的大锹、钱包、整枝剪、嫁接刀,等等。这一幕幕、一声声、一件件,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回忆和联想、感和警示。

文革前,母亲就是按月凭工分拿工资的场圃工人,每月报酬从几块钱涨到十几块钱,捏捏卷卷,塞进小衣袋钱包里。母亲的那只小衣袋钱包,是从旧中山装上衣小口袋拆下来的。小口袋上,还留有纽扣,有时还有个把小布丁,但总是干干净净、板板扎扎。这种小衣袋钱包,母亲用过好几个,黑的、蓝的、灰的。母亲干活要强、聪明,在嫁接、修剪、扦插、疏芽、治虫、施肥、挖河等项中,总是走在人前。凡是结对、配组的活儿,人们总是争着和母亲在一起,母亲的工分值总是名列前茅。有几次放电影前,在银幕上还用幻灯快板书的形式,表扬母亲的一些事迹。每次放幻灯片之后,我们总是要得意好几天。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前,母亲的那些小钱包也没有鼓过。当时,父亲是果园场采购员,1969年调至县化肥厂做采购工作。他常年在外,有时出差十几天或半年才回家。即使回来,在家最多个把星期,就又出差了。那时,我们姊妹三个(我、妹妹、弟弟)还小,吃穿上学开支,人情往来花销,工资收入总是月光。母亲有时手头实在很紧,不到月底,钱包空空,就向果园场的唐志美和王祥云大妈、徐益良伯伯、蚕桑场的张淦泉医生、侯敬民技术员借钱,等下月发工资或父亲回来还上。

文革中,我们家从果园场搬至蚕桑场。文革结束后,父母也涨了工资。加之母亲在本职工作之余,也搞些边角地,弄点小副业。常常天不亮,就从八里开外的蚕桑场(八里松),挑着青菜、茼蒿、韭菜、扁豆、丝瓜、山芋等,到高邮南门去卖,卖完即回场里上班。一角二角、三块五块的,积少成多,小衣袋钱包也鼓了起来。那时,我们家住的是蚕桑场公房,因场部生产、后勤、办公等需要,常常要搬家,两三年就搬一次。我们慢慢长大,临时分的公房也不够住,加之多次搬家,也着实烦透了。父母发狠,自家建房。1972年,父亲请化肥厂领导批给计划,用煤渣补差,和窑厂换了点青砖,在蚕桑场建起了三间私宅(四年后又往东接了一间)。墙的下半段是实心墙,上半段是斗子墙,七架的刺槐房梁,椽子是用芦柴把子扎成的,盖的灰色大瓦,有个小小的后院,院子里打了水井。为建房,家里真是倾其所有了。一天晚上,母亲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不小的纸包,解开塑料皮,打开报纸,里面包的是二角五角、一块五块十块的钞票。这些是母亲进城卖菜积攒下来的“私房钱”,看后着实令父亲和我们吃惊不小,感动不少。如此七拼八凑还是不够,又和场里的同事、涟水老家的亲戚借债。从小衣袋钱包到报纸包,房屋落成,母亲的钱包被掏空了,父母的血汗好像也给掏干了。

1987年1月,母亲退休了,退休金从几百元慢慢增至三千多。我们也都成家立业,各家过着满意的生活。父母也进城居住,颐养天年。父母的退休日子蛮惬意的。母亲的钱包,也从中山装的衣袋,换成自己手工的小口袋,还缝上了小拉链。那些各色花样的小钱包,倒也精致,只是小些。好在就装些零花钱,也够放了。日子好了,母亲还是节俭如初,能

二爷是我老爸的嫡亲弟弟。在我心目中,他可是一个了不起且很让人敬佩的人。

小时候,奶奶最喜欢和我讲二爷的故事。二爷的故事很多,而且一般。他聪明能干,和善大方,最主要的是他做事特别认真,也特别较真。奶奶在世从不叫他名字,而是叫他“真真子”。

二爷十六岁那年农中毕业了。由于表现突出成绩优秀,他和另外两个同学被公社破格分配到当时县林木业基地之一的周巷马庄苗圃工作,作后备干部培养做技术员。苗圃虽离家仅里把路,但二爷以圃为家吃睡在那里,十天半个月也难得回一趟家。奶奶不放心他,时常三天两头地去看他。刚到苗圃时,二爷什么也不懂,对林木知识更是一窍不通。为了早点掌握林业技术,二爷没日没夜地学习,连走路吃饭也不离书本。为了理论联系实际学到真本事,他还到离家较远的县果树实验场拜师求教学艺。由于二爷刻苦认真,做事较真,仅一年时间就弄懂了一些林木方面的门道了。

那时正处于大力发展林木业的高峰期,桃梨苹果苗需求量大,从外地购进不仅成本高,而且还远远不能满足。为了降低成本快速推广,二爷学会了嫁接。这可是“一把刀”的技艺,看似简单,实则难以把握,稍有丝毫差离树苗便不能成活。从削树枝嘴子到实际嫁接再包扎好,不仅手腕要稳,力道要狠,分寸要准,而且必须一气呵成才能成功。为了练成这刀功,二爷不知手皮磨

## 母亲的钱包

□ 淖柳

省的则省,不当花的不花。父母的社保存折都交妹妹代为打理,妹妹按月取出父母的退休金交给母亲。除了水电、吃穿、零用等日常生活开支外,母亲总是将多余的,交妹妹再存回去。妹妹多次责怪母亲,反正是自己的钱就用呗,省着做什么?母亲总是笑着说,够了,够了,存一点不要紧。

一天午休之后,我开车带母亲出来转转,意在去做她的思想工作,劝她该吃的吃、该花的花。为了鼓励用钱,还哄着她,我们姊妹几个不差钱;特地带母亲到银行自动取款机前,用我的工资卡,提款给她看,并对她说,就放心用吧,你看用了又来了。母亲第一次看到钱会自动吐出来,很是新奇,又有些担心,竟对我说,这些钱干净吗?你爸爸做一辈子采购员,没有被人戳一个手指头,你们在外工作要当心呢。母亲的话,既让我哭笑不得,又是对我们最大的疼爱和最深的提醒。

2011年3月,母亲患了肺癌,断断续续住院医治三年多,有关医院、医生真是尽心尽力。我们一直瞒着确诊,直到最后母亲也不知自己患的是肺癌。患病中期,因时常呼吸困难,母亲预感可能是绝症。在还能走动的时候,她提出由我们陪同,专程去了一趟果园场,带了几份礼,分别送给那些曾经帮助过我家的阿姨、伯伯和大妈们。老同事相聚,真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谢,母亲忆着笑着,擦着止不住的热泪。那种真情善意,让我们做子女的深为感动。后来卧床不起时,母亲还再三交待,要代她感谢张淦泉医生、侯敬民技术员。母亲过世之后,我和妹妹分别走访了张、侯两家,代母亲表达了心愿和谢意。

因有些药是不能报销的,如当时进口的易瑞沙就不在医保范围,每瓶1700元,每月用完后再买;夜里,间隙用些护工,护工费也是自理。母亲的积蓄几乎都贴了进去。患病不久,母亲就将她的社保存折交我保管,让我执掌退休金的的使用权,并对我说,每月折上就这么多钱,看钱用药吧,实在不行就不看了,出院回家,听天由命。我们姊妹仨再难,也要保证母亲的医治。尽管治疗和有关费用不低,我还是每月从母亲的退休金中留出500元,交她零用。母亲说,到这个份上,我还用什么钱?不肯接收。再三推让,我还是让母亲收下了。

在母亲逝世前个把月的一天上午,母亲将我叫到床前,拿出她亲手制作的花布钱包对我说,你给的每月500元,我也用了一些,这是结余的,现在归你,以后还有正用。我不肯接手。母亲说,听话,你拿着,放我这里压床有什么用呢?我让妹妹过数,总共8525元。母亲在世时,这个钱和钱包总是放在我的皮包里。夜深人静,我有时也对着钱包发呆,如能出现奇迹,让母亲重新站起来,花他自己的退休金,享享清福,该多好啊。然而,夕阳西下,人生灯熄。带着对子女的怜爱和对世界的眷念,母亲于2014年5月10日离开人世。料理完母亲的后事之后,我将母亲交留的8525元,单独存了起来,至今未动一分;将母亲缝制的花布钱包清洗、晾干,用塑料袋包好,放在我的手提包里,无论我走到哪里,钱包总是随我而行。每当想起或触碰母亲钱包的时候,我就觉得:母亲的钱包不只是装钱,它装着多种精神和物质财富,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和慢慢享用。

## 二爷

□ 陈岚

破了多少次、血淌了多少回。他连续多天从早到晚一遍又一遍地练,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功夫不负有心人,二爷熟练地掌握了嫁接技术,接着又带出一大批徒弟,以最好的技术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数以万株的梨树嫁接任务。为此,二爷还得到了公社的表彰。后来由于大办农业种粮食,退林还田,苗圃功能不再,二爷便回家务农。在奶奶和爸爸的张罗下,不久他拜了一位王姓瓦匠师傅学了瓦工手艺。

农村有句俗语,“学徒要吃三年萝卜干子饭”,意思是学个手艺不容易。一是要吃苦,二是时间长。可聪明的二爷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出师并开始独立做工了。又过了两三年,二爷自己开始带徒了。二爷的徒弟大多也如二爷一般做事认真、较真。由于二爷手艺好,做事快,找他干活的人家和单位多得不得了。二爷成了大忙人,除了雨天不好施工,一般没有闲的时候。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二爷今年虽然已经七十岁了,仍然帮人家登高砌墙粉刷瓷砖。我堂妹堂弟(二爷的女儿和儿子)他们毕业后分配在上海,逢年过节回家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苦苦劝他,叫他不要再做了。他就是不听。我性子直,也不止一次劝他,儿女们孝顺,钱足够花,该歇歇了。二爷说,一天不拿瓦刀手发痒,一天不上高墙浑身不自在,劳动命做惯了,歇下来反而身体不舒服。

二爷辈份高,手艺好,经验多,徒弟徒孙一大帮,但他从不倚老卖老,做事依旧认真较真。

金秋十月,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田间地头到处是收割机的隆隆声,划破了往日的平静,车来人往构成了秋收的美丽画卷。收割机代替了原始的劳作,“割、挑、脱、扬、晒”等一道道原始生产工序压缩成简单的“装”和“运”,不能不说生产力得到了“质”的飞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民以食为天,沉甸甸的果实使我们的小康生活得到了根本保障。

而在几十年前,秋收则是另一番景象。公社、大队层层召开秋收生产现场会、动员会,一心一意搞好抢收抢种,简称“双抢”。学生也会放长假支农。男女老少齐上阵,用镰刀收割,用扁担挑把,用机器脱粒,用木锨扬尘,靠太阳晾晒,短短一周时间就能基本完成秋收任务,但还不能算颗粒归仓。因为收获的粮食水分较多,既不利于保存,又不方便粮站收购,因此,需要晾晒这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也很复杂,牵扯着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那个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年代,粮食可是无比珍贵,防火防盗一刻也不能放松。提高警惕,保卫粮食,看场环节必不可少,也是秋收的后续工作之一。当然,夏收季节也有过看场的日子,只是麦子晾晒的时间比较短,遇到好天气,只用两三天时间就可以直接送粮站出售了。

看场就是守候在生产队场头,确保到手的粮食不失窃,不遭雨、火等灾害。秋收后的看场时间比较长。伴随着稻谷从收割到出售的全过程,一般个把月,有时拖延到立冬前后。白天人声鼎沸,一般由生产队保管员负责看场就可以了。晚间就不一样了,占地五六亩的偌大场头空无一人,这时候场头上的粮食最容易失窃。加强晚间看场力量是必须的,生产队一般会安排两三个男社员看场,可以壮胆,也不寂寞;相互之间还可以监督,有效避免监守自盗。更重要的是遇到恶劣天气或其他突发性情况可以先行组织处理,减少损失。

看场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太阳一升起,社员们就开始将一堆堆稻谷分摊成薄薄的面积不等的区域,增加太

## 看场

□ 韦志宝

阳照射的表面积,加快晾干速度。每隔一两个小时,还轮流翻晒一次,保证所有稻谷都能受到太阳的照射。太阳落山时,社员们又将分摊的稻谷恢复原样收拢成一堆堆。这时候,生产队保管员主动请队长或会计和当晚看场的社员一道,依次给每个稻堆打印。印章的形状与药箱并无两样,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使用印油,印迹也不是红色的,而是使用石灰,自然就是白色的了;印模内容一般为“某某大队某某生产队印”,分两路依次排开,字迹端正,打印在稻堆上的印迹密密麻麻并清晰可见。打印完毕,算是保管员与看场人员交接仪式结束,看场人员开始履行看场职责。第二天早晨,看场人员与保管员再次进行工作交接,生产队长或会计监交,主要点验印迹有无破坏的痕迹,印迹正常表明粮食没有失窃。之后,再由社员们摊开稻堆晾晒,如此循环往复。

看场也有乐趣。讲故事算是其中之一了。晚上没有电视可看,就连半导体收音机也是奢侈品。即使遇到大队放电影,看场人员也不敢擅离职守,只能守候在场头讲故事消消遣。有些故事是从公社广播里听来的,添油加醋地讲讲,也能听得津津有味。有些故事则是依葫芦画瓢,不再是原汁原味,无外乎“小尼姑下山”“王老虎抢亲”“王瞎子算命”等等,风趣也好,低俗也罢,逗乐而已。烧夜餐算是最大的乐趣了,但并不是每个班次都有的,要有好的运气,遇到有心机的看场人。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心机的看场人一般选择印迹与印迹之间比较稀疏的地方,搞个十来斤稻谷,然后派人到附近的屠户家中悄悄地换回一点猪肉,在生产队喂猪用的大灶上加工,香喷喷的红烧肉可解馋了。

如今,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大型收割机,有了粮食烘干机,收割下来的粮食灌装到口袋里,直接运送到粮食收购点,秋收就算结束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了用武之地的场头及看场的公房早已没有了踪影,看场的社员也渐渐老去。

## 和妹妹一人一半

□ 王晔

小时候在家,听到爸爸妈妈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和妹妹一人一半。当时听着是多么兴奋,因为又有好吃的了。现在回想起来,又是多么亲切,因为那一个从小到大的家,有爸爸妈妈有我妹妹的家,是多么温暖和温馨、自由又快乐。

我是姐姐,妹妹小我一岁多。因为有了她,我才可以做姐姐,并且一直可以有她叫我姐姐。不像有的同学和朋友家,甚至年龄还相差好几岁的妹妹,都已经对姐姐直呼大名了。当然也看到和听到,为了一点家产,姐姐和妹妹间吵架打官司,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而我和妹妹之间,从没有在乎和计较过这些,更多是面对父母给予时的相互谦让,也只能说太感谢家教了,还有就是那“和妹妹一人一半”的习惯吧。

我们小时候,物质匮乏,可爸爸在他也不算多的工资里,尽可能有什么好吃的都买给我和妹妹吃。他认为,吃得好孩子的身体才好。还记得暑假里,爸爸会一次买回来差不多十几个西瓜,堆在墙边的桌子下,随便我和妹妹怎么吃。梨子和苹果也是,自己吃,请来家玩的同学吃,都无所顾虑,反正吃完了,爸爸还会再买。

因为西瓜大了,因为梨子、苹果多了,所以就不方便实践“和妹妹一人一半”的分配了。而那些小的零碎的,比如夏天饭后的菱角,基本上每天一人半斤地先后分吃。吃得快与慢,也仿佛楚河

之于汉界,两不相犯。蛋糕、饼干什么的零食,都一样。遇上有大小的单颗的水果和零食,我又发明了另样的“和妹妹一人一半”,比如第一个由我先选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就由妹妹挑,如此这般,看起来很公平的谁都不会吃亏。或者我把好吃的先分成两堆,让她先挑选,剩下的归我。

当然我和妹妹也有违背“规则”的时候,因为妹妹很多时候并不看重我的分配,只顾着我说吃完了,她赶紧吃她的那一份。如果是实在太好吃的,她很快吃完了,而我还在那细嚼慢咽着,她也会忍不住来抢我的那一份。我若是不给不让她坚持“原则”,说不定就会引发“战争”。爸爸妈妈看我们吵嘴打架,却是很开心地哈哈大笑。是呀,看着自己的女儿那么好玩那么逗,如果是我,也一定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的。那时的我总是使用自以为强大的“杀手锏”,不理妹妹,不和她说话。不过她多逗我几次,多喊我几次姐姐,我们又是一个家里相处、一个房间里睡觉的亲姐妹了。

我高三的时候,升高二的妹妹去邮中上学了。突然间的冷清,却又有些仿佛独生子女的享受。那些好吃的都是我一个人的了,吃着吃着,却没有那么多独自霸占的兴奋和开心,除了那些不能久置等待两三个星期才回家一次的妹妹,只要是可以多放几天不会坏的零食,我都会留着给妹妹,也不会再在乎只分一半给妹妹了。每一次等到妹妹回来,我比过节还开心。妹妹也会带给我学校门口的小玩意,因为知道我喜欢。而且她不在家的日子,我们还彼此写信,反而增进了感情,也再不会吵架了。

很高兴父母生了我,又给了我妹妹。